中俄美高峰會展現中國的責任擔當



大國外交

宋魯鄭

11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三天之後中俄美三國元首將在深圳舉行會晤。這是中俄美三國元首歷史上首次面對面會晤，將圍繞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大國關係戰略穩定深入交換意見，具有開創性意義。

從國際關係角度，這是1840年以來，積弱積貧的中國奮發圖強走向復興的一個階段性寫照。俄、美都是現代史上的傳統強國，特別是二戰後雙方以超級大國的身份形成兩極格局。現在中國卻以東道主的身份主持三方會晤。人類文明史的突破性意義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這也標誌着疆域龐大人口眾多的陸權、主權國家再度主導國際事務的開端。回到國際政治現實面，三國元首峰會的舉行不僅是相對匹配的綜合國力，也有共同的利益和需求。

俄羅斯是此次三巨頭峰會的積極推動者。自俄烏衝突以來，它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孤立，外部地緣環境惡化，自由空間大幅壓縮，甚至被歐洲貶為地區性大國。但憑藉這次峰會，不僅很大程度上打破上述困境，更對和自己對抗的歐洲形成兩大制約：一是歐洲連大國談判桌都上不了，形同歐洲才是地區性力量，歐洲抵抗的士氣和意志力受到削弱；二是進一步影響歐洲和美國的盟友關係。畢竟美國作為大西洋夥伴卻選擇和俄羅斯共商共議，把盟友邊緣化。

這次外交操作也顯示了俄羅斯傳統大國的底蘊，它成功抓住和滿足了特朗普中期選舉後急於證實自己依舊強大的需要，從而把美國拉到峰會的倡議者一邊。當兩大傳統強國和冷戰時的超級大國聯手向中國請求時，不僅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崇高的國際地位，也使得中國接受東道主的角色。

對於中期選舉失敗的特朗普來講，外交是他如今為數不多顯示力量的舞台。因此前所未有、歷史上首次舉行的三方峰會對他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事實上，早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他就提議中美俄三方舉行核武器談判，討論如何終止軍備競賽。2019年更要求國務院準備推動三邊會談。2025年他第二任期剛開始就又舊話重提。不過如果看一下特朗普任期內的作為，這恐怕只是一個藉口。但不管特朗普是真的要談問題還是以此為藉口創造歷史，舉行三大國峰會是他一直以來的執念。現在這一機會終於來臨，他自然趨之若鶩。

從歷史的角度，中國的超強大國地位首度以這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凸顯出來。其意義不亞於2025年面對特朗普對全球發起的霸凌式關稅戰，中國是唯一進行反制並迫使其妥協的國家。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應對非常高明，頗類似於當年美國崛起後，在主導國際事務的歐洲一再邀請下才參與重大國際事務。

畢竟任何國家崛起，都會對世界利益格局產生影響，極易成為眾矢之的。這種方式則可將外部不利因素最小化。比如歐盟和俄、美都處於對抗狀態，它被排除在外自然對此類會議分外敏感，擔心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利益受到損害。中國的方式使得歐洲只能把目標針對美俄，中歐關係也不會發生衝突並為改善創造條件。

其次中國也將獲得實質收穫。一是美俄兩大國積極希望中國玉成的事必然要有回應，這也增加了中國和美國談判的籌碼，也有助於中美戰略穩定關係的維繫。

二是其他相關國際力量為了自己利益而主動和中國協商。比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10月訪華時就專門就此與中方會談，考慮到峰會和德國並無直接關係以及德國在歐盟的代表性，也可以理解成歐盟的立場。由於歐洲和美俄關係緊張，它唯一能借助的力量就是中國。韓國外交部長也在峰會前五天訪華，並據韓國外交部在駐華使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的表示韓國已經向中美就此峰會進行了溝通。

三是和中國有衝突的日本和菲律賓感到高度壓力。這兩國安全上依賴美國，不樂見中美關係走向戰略穩定，更不希望有這樣的峰會。以日本為例，它恐懼被美國拋在一邊做交易，美中俄直接協調，使得它苦心構建的對華、對俄圍堵態勢將形同虛設，其在北方四島、烏克蘭等問題上的單獨要價也會被大國框架覆蓋。為此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向華盛頓表達擔憂，希望美方推進三邊安排時顧及日美同盟，不要損害既有的安全保障秩序。外相也曾專門與美國務卿溝通，但未能獲得「不單獨對華對俄讓步」的明確承諾。這使得調整對華關係的壓力猛增。

四是對兩岸統一和兩岸關係的影響。中國大陸的世界級大國身份和中美關係以這種方式呈現出來，對台灣社會各界無疑具有強大衝擊性。統一力量會增強信心，分裂勢力則倍感壓力。

雖然利益是國際關係永恆的話題，但有着很強道義性的中國文明和西方不同，不會如二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的西方國家那樣犧牲他國利益，劃分勢力範圍。**一直以來，中國堅持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支持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尊重聯合國憲章和權威，強調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衝突的政治解決。所以中國參加三國高峰會並施加影響是世界之福，也體現了中國的責任和擔當。**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釐清憲制根本 維護行政主導

看香港

李匡蹟

香港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不是憑個人喜好去理解，必須依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依據法律條文去認識。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在《大公報》發表《政體源於中央授權　行政主導不容歪曲》一文，清晰闡釋「政體法定」、「政體央定」基本憲制原則，以及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法律依據，對社會上存在的一些曲解、尤其是將香港政體等同西式「三權分立」的觀點，逐一作出有理有據的辨析，及時必要、正本清源，值得社會各界認真研讀，準確把握。

特區政體源於中央授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體，並非自發生長、獨立形成，而是源於中央授權，這是理解香港整個憲制秩序的根本起點。行政主導，是香港特區憲制設計的核心安排，同中央授權的邏輯一脈相承。

只要翻看基本法就能清晰看到，法律設計的架構，絕非西式「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體制。行政、立法、司法三者，是同一授權體制之下的職能分工，並非主權國家那種平行對立、互相抗衡的分權架構。

自香港實現撥亂反正後，香港社會對憲制秩序已經形成了廣泛且高度的共識，但一些錯誤的認識依然存在。例如，認為行政主導「本質是三權分立」、「兩者平行共生」等等。**這些看法似是而非，是受西方政治學國家分權理論影響的結果，更與過去香港一些勢力極力在基本法之外「重塑」香港的政治體制的行徑密不可分。但從歷史到現在，香港從來都沒有西式「三權分立」，回歸後在新的憲制秩序下，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進一步清晰，沒有任何模糊之處。**

當然，強調行政主導，不等於否定立法會監察職能，亦不等於削弱司法獨立。基本法本身已經明確立法機關的監察、審議、制衡權限，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審判，這都是制度內置安排。行政主導的核心，是確保特區政府具備主導施政、推動長遠政策的能力，避免議會過度對抗、政府決策空轉，造成治理癱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經濟轉型、房屋、土地、創科等大量深層次難題，恰恰需要強而有力、高效統籌的行政主導體制，凝聚社會共識，落實長遠規劃，例如北部都會區建設、首份五年規劃等重大戰略，都需要行政機關主導推進，立法會依法監察配合，司法守住法治底線，三者有序運作，方能形成治理合力。

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全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社會最大的共識，就是穩定同發展。穩定的前提，是憲制秩序穩定；發展的關鍵，是治理體制順暢。如果憲制認知持續被歪曲，行政主導體制被動搖，往小處看，會影響個人對香港的正確認識，往大處看，社會就容易重陷爭拗內耗，拖慢重大政策落地，錯失國家發展同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機遇。所以，正本清源、統一社會對行政主導的認知，不只是法理層面的辯明，更是服務香港長遠繁榮穩定的現實需要。

進一步強化社會正確認知

持續做好憲法同基本法宣傳教育，讓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準確理解香港憲制本源，認清行政主導的制度原意，自覺抵制錯誤政制論述。社會各界要在正確憲制共識之下，支持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立法會依法履職、理性議政，司法機關維護法治，形成協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總而言之，「政體源於中央授權」是根本，「行政主導」是制度核心。鄧中華會長的文章，及時重要，撥亂反正，提醒全社會守牢憲制底線。香港唯有堅持正本清源，尊重憲制本源，堅定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方能持續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行穩致遠，實現長期繁榮穩定。

把握APEC機遇 開拓新發展格局

議事論事



林順潮

當前世界經濟正經歷深刻變革，國際間的經貿摩擦、地緣政治風險及供應鏈調整，亦為全球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在這個關鍵時刻，如何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變局中創造機遇，已成為亞太各經濟體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2026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系列會議在深圳舉行，為各方提供凝聚合作共識、探討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平台，也讓國際社會從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角度，進一步認識中國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

今次APEC落戶深圳，讓亞太各經濟體有機會親身了解中國創新產業的發展成果，以及大灣區如何透過城市之間的優勢互補，形成完整的創新生態。對香港而言，這也是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的重要契機，透過結合國際金融、專業服務、科研教育及國際聯繫等優勢，與深圳的科技產業及廣闊市場加強合作，進一步參與亞太區域發展，在新一輪全球科技與產業變革中發揮更具實質性的作用。

發揮優勢深化區域合作

中國選擇深圳作為今屆APEC的重要舉辦城市，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深圳從改革開放前沿發展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業的重要城市，正是中國堅持對外開放、深化改革及推動產業升級的縮影。

深圳的發展經驗亦說明，科技創新、市場發展與國際合作三者息息相關。持續推動人才、技術、資本與市場的有效連接，有助加快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深圳APEC為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深圳具有強大的科技研發能力、完整的產業配套及龐大的市場腹地，香港則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普通法制度、成熟的專業服務體系，以及廣泛的國際商貿網絡。兩地各具特色的制度和產業優勢，為深化區域合作提供良好基礎。

隨着全球產業競爭逐步走向產業鏈、創新生態及制度環境的綜合競爭，深港合作亦迎來深化制度協同、產業聯動和國際合作的新階段。尤其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知識產權、數據流通及專業服務等領域，香港可以發揮國際化制度優勢，為大灣區創新企業提供融資、風險管理及跨境服務支援。

國際大型會議帶來的人流、資金流及資訊流，為城市及區域經濟發展創造寶貴機遇。香港可以善用APEC建立的國際聯繫，加強與各經濟體的商會、科研機構及企業合作，推動更多具體項目落地，吸引國際資本、技術和專業人才匯聚大灣區，逐步形成長期而穩定的國際合作網絡。

醫療創新是大灣區參與亞太合作的重要發展方向。人口老齡化、慢性疾病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迅速發展，令各經濟體對創新醫療技術及高質素醫療服務的需求不斷提升。香港擁有具國際水平的醫療專業人才、臨床研究能力及醫療服務體系，深圳則在人工智能、醫療器械及科技產業化方面具有優勢，兩地合作具備良好基礎。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將完善臨床試驗及醫療創新生態列為重要方向，2026年施政報告亦提出加快建設國際醫療創新樞紐。

與此同時，醫療創新亦需要兼顧醫療數據安全、患者私隱及國際科研倫理標準，確保科技發展與病人保障並行。香港可發揮連接內地與國際醫療體系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的創新藥械走向國際，同時引進世界各地的先進醫療技術，促進「健康中國」建設與區域醫療合作相互融合，讓科技創新的成果真正惠及人民健康。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落實的重要階段。深圳APEC的舉行，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提供重要啟示。香港可以透過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自身國際聯繫、金融法律制度、科研教育及專業服務優勢，轉化為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實際能力。

積極融入延伸至主動服務

在國家發展新階段，香港的角色亦可由積極融入進一步延伸至主動服務，透過參與國際合作、助力國家企業開拓海外市場，以及為國際資本、科技和人才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支援，深化香港在國家與世界之間的橋樑作用。這既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也為未來提升國際競爭力開拓新的發展空間。

深圳APEC為香港與大灣區開拓亞太合作新格局創造重要契機。展望未來，香港可憑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進一步發揮三重角色：「超級聯繫人」發揮香港廣泛的國際網絡，促進國家與亞太各經濟體之間的交流合作；「超級增值人」結合金融、醫療、法律、科研及專業服務優勢，提升產業發展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價值；「超級合夥人」則與內地城市及國際夥伴共同開拓市場、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合作，攜手參與國際競爭，讓香港可以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及全球經濟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APEC深圳會議推動亞太合作開啟新局面

有話要說

陸文英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今日起於深圳舉行。中國作為此次會議的東道主，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核心主題，向全世界遞出一張開放包容、務實進取的合作名片。此次會議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世界和平發展將帶來積極影響。

一、引領亞太合作 厚植地區和平動能

為大國分歧設置「管理護欄」，避免誤判升級。本次APEC框架下的高層會晤，首先將為中美兩國搭建起最高層級的直接溝通渠道，把此前外交、經貿、政黨對話等多個層面達成的共識進行確認和昇華，避免基層執行環節出現信息偏差。雙方此前已經在人工智能安全、超級智能風險防控等新領域達成初步溝通機制，本次高層會晤可以進一步把這些機制落地為可執行的操作框架，為新興領域的合作劃定邊界，防止技術層面的分歧上升為戰略對抗。

為APEC多邊合作注入動力，避免區域機制被邊緣化。中美作為APEC中經濟佔比最高的兩大成員，在本次會議上的相向而行，將直接為APEC的三大優先領域推進掃清障礙。本次峰會，美國參會企業佔近兩成，數量為所有外方經濟體之首，這充分反映美國工商界對亞太市場、中國市場的現實需求並未因地緣氛圍變化而消退，企業迫切需要透過面對面溝通穩定供應鏈、鎖定市場增長空間。這種大國層面的正向互動，也將向整個亞太傳遞明確信號，就是開放合作遠比封閉對抗更符合區域共同利益。

為後續雙邊和全球治理鋪路，累積長期合作信任。通過面對面的深度溝通，將為後續G20等重要國際場合的互動累積信任基礎，也能為青年交流、民間往來等人文領域的合作打開新的空間。尤其是一系列重大元首會晤，是當今世界尤其是亞太格局中極具標誌性的事件。從具體角度看，中美在APEC框架下形成的合作範式，也將為全球層面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經濟復甦等共同挑戰提供示範。

二、彰顯主場外交 塑造開放發展優勢

主場外交的主動塑造。中國從「規則接受者」轉向「議程引領者」，將「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領域和亞太自貿區、互聯互通、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議題納入議程，為區域合作提供「中國方案」。中國再次向國際社會傳遞將以亞太自由貿易區互聯互通為抓手，推動區域內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最終實現各經濟體的共同增長。

回應逆全球化挑戰。在保護主義抬頭、地緣博弈加劇背景下，中國通過APEC平台重申開放包容、互利共贏，對沖「脫鉤斷鏈」和陣營對抗風險，為區域經貿注入確定性。向全世界展示了攜手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務實姿態，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多邊治理體系中的公信力與話語權。

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窗口。深圳從漁村到國際大都市的變遷，是改革開放成果的直觀呈現，讓與會領導人親身感受中國發展路徑與改革開放決心。

三、釋放協同潛能 擦亮深港聯動價值

深圳城市能級與國際影響力躍升。這是深圳建市以來承辦規格最高的國際盛會，將提升其全球城市辨識度，強化「奇跡之城」「科技之城」標籤，並帶動會展、文旅、消費等「以會興城」的乘數效應。

促進經貿合作深化。深圳對APEC經濟體進出口值從1996年的2675億元，增長至2026年10月已超5萬億元，今年上半年來自APEC經濟體的實際使用外資佔全市總額93.6%。會議將進一步暢通貿易循環、吸引外資和研發中心落地。此外，會議籌備推動交通、服務、國際化標識等細節升級，形成可常態化的治理經驗，助力城市高質量發展再上新台階。

「一會兩地」深港協同新模式。領導人會議在深圳、財長會在香港，形成APEC框架下少有的「一會兩地」格局，將香港的金融法治優勢與深圳的科創製造優勢嵌入同一國家議程，展示大灣區制度組合競爭力。深港協同釋放「1+1>2」的疊加效應，兩地產業互補、地理相連，早已形成密不可分的發展共同體。香港外貿總值的87%與APEC成員往來，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支付經香港處理。財長會進一步鞏固其作為跨國資本對接核心和離岸人民幣樞紐的角色。

綜而觀之，2026年深圳APEC峰會，不僅是一次重要的多邊外交盛會，更是中國與亞太各經濟體攜手應對挑戰、共創長期繁榮的「深圳宣言」及重要歷史節點。尤其對香港而言，這是深化與國家發展戰略對接、進一步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的寶貴機遇。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支撐下，深港兩地強強聯手，勢必將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為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注入更多確定性與蓬勃活力。